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

彝文古籍 与西南边疆历史

张纯德 朱琚元 白兴发 / 著



YZLI089017327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本书是通过彝文古籍，对西南边疆的历史、文化、风俗、军事等方面进行的研究。本书以秦汉时期滇东北、川南、黔西北地区所用的彝文原著译本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文献学等多学科，以“彝人、彝语”的崭新视角重新审视西南边疆档案史料中存在的疑难问题。首次将我国少数民族古籍中的彝文史料做了系统的开创性研究，有理有据、观点鲜明，不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对丰富西南民族史、地方史，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彝文古籍 与西南边疆历史

上架建议：历史

ISBN 978-7-5097-4165-8



ISBN 978-7-5097-4165-8

定价：96.00 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

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

彝文古籍 与西南边疆历史

张纯德 朱瑞元 白兴发 著



YZLI089017327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
研究项目·研究系列”
编 委 会

主 任 马大正

副 主 任 晋保平

成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方 铁	方素梅	吕余生
刘晖春	刘楠来	孙宏开	李世愉
李国强	李斌城	杨 群	宋月华
张振鷟	周建新	贺圣达	晋保平

总 序

“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以下简称“西南边疆项目”）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管理。“西南边疆项目”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研究方向，其中基础研究类课题成果结集出版，定名为“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以下简称“西南边疆研究系列”）。

西南边疆研究课题涵盖面很广，其中包括西南区域地方史与民族史等内容，也包括西南边疆地区与内地、与境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史研究，还涉及古代中国疆域理论、中国边疆学等研究领域，以及当代西南边疆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等。上述方向的研究课题在“西南边疆项目”进程中正在陆续完成。

“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的宗旨是及时向学术界推介高质量的最新研究成果，入选作品必须是学术研究性质的专著，通史类专著，或者是学术综述、评议，尤其强调作品的原创性、科学性和学术价值，“质量第一”是我们遵循的原则。需要说明的是，边疆地区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必然涉及一些敏感问题，在不给学术研究人为地设置禁区的同时，仍然有必要强调“文责自负”：“西南边疆研究系列”所有作品仅代表著作者本人的学术观点，对这些观点的认同或反对都应纳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范畴，切不可将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发表的学术论点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以过度的评价或过分的责难。只有各界人士把学者论点作为一家之言，宽厚待之，学者才能在边疆研究这个颇带敏感性的研究领域解放思想、开拓创新，



惟其如此，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科学、公正和客观，也才能促进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不断繁荣。

自 2008 年正式启动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高度重视“西南边疆项目”组织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西南边疆项目”领导小组组长江蓝生同志对项目的有序开展一直给予悉心指导。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云南省委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及云南、广西两省区高校和科研机构领导、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参与，在此一并深表谢意。“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对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大力支持，编辑人员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一贯为学人称道，值此丛书出版之际，表达由衷的谢意。

“西南边疆研究系列”编委会

2012 年 10 月

| 前 | | 言 |

本书是“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中的一个课题成果。

在本课题结题出版之际，围绕这个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内容、研究方法及其成果的价值等作简要介绍和说明。

一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是意义

本课题原定名为“彝文古籍中的西南边疆历史研究”，后更名为“彝文古籍与西南边疆历史”，顾名思义涉及彝文古籍，但不是仅研究彝族史；涉及西南边疆档案史籍，但不是完整的西南边疆史；重点是研究彝文文献中涉及的西南边疆档案史籍，从纵向、横向来研究比较两者之间的联系，互相印证、互相补充，“证史之有，补史之缺，正史之误”。当前懂彝文的人不一定懂西南边疆历史，懂西南边疆历史的不一定懂彝文，本课题作者正好同时具有彝汉文的优势，从具体的彝文古籍中记载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来探讨前人未涉及的问题，并补充西南边疆档案史籍，揭示西南边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彝文古籍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多彩，很早就以成熟的文字记述西南边疆史。在中国，除汉文史籍外，难得有用民族文字记载的民族古代史籍，因此早就引起前辈学者丁文江、杨成志、林耀华、马学良及治史学家马长寿、方国瑜等先生的关注和引用。然而由于多种原因还有许多史籍鲜为人知，甚至连本民族的人都不知道有没有彝文古籍，更不知其记载的内容，在“彝文宗教迷信论”影响下，不能正确认识其价值而使其被淹没。所以一提起西南民族史，无非从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始，对司马迁记载确信不疑，至于司马迁所写的这些部落番号与今日民族有何关系，数以十计百计的君长具体是哪些人，都不得而知，对司马迁从未记录的历史就更不得而知。我们认为汉文史书没有记载的并不等于实际历史不存在，而彝文文献恰恰可以“补史之缺”。

二 本课题研究的内容

1. 以时间来说，以秦汉时期为主。因为秦汉时期史书、地方志关于西南边疆的资料极少，彝文古籍可以弥补这一空白。西南边疆的历史自唐以来汉文史籍不少，但只是封建王朝的一面之词，难免有偏见，而这时期彝文古籍较多，可以“证史之误”。

2. 以地域来说，以滇东北、川南、黔西北为主，以云南为重点。因为当时贵州还未设省，昭通也时而划四川，时而划云南，都是古代巴蜀、滇国、夜郎交会之地，特别是昭通、曲靖地区，古代是云南边疆和内地的通道，中原王朝、主流文化、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爨文化、彝文化）的交会点，也是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和重点，战争相对频繁，史料也相对丰富。

3. 以所用的彝文古籍来说，以云贵（东部方言）的史籍为主线索，以原著译本（或称原始文本）为主，并吸收研究论著（或称研究文本）。史料充分、内容丰富，本成果只是历史文化层中的一个侧面，但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叶以知秋。

4. 以内容来说，从彝文古籍记载的古人名、古地名、古史、古部落氏族君长谱的若干零散的史籍，试图证实司马迁记录的西南夷君长以十数百数的存在，“证史之有”。

5. 以体例来说它不是完整的彝族史、完整的地方史、完整的民族史，而是特定区域、特定部族在特定朝代中散落的片断记忆；它也不是专门论证或考证某段历史，所以不完整、不全面、不系统，但可作为某一时、一史、一事的记录。

6. 在族群上以与彝语支民族先民有关的“西南夷”为背景，以彝族为主线。



7. 以叙事者角度来说,本书作者用彝语、彝文古籍、彝人的角度来审视,难免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属开创性工作,是一个良好开端,其价值意义不言而喻。

三 本课题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有新的突破

1. 利用“五古”〔古夷(彝)语、古夷(彝)文、古人名、古地名、古史〕研究西南边疆档案史料,以崭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西南边疆档案史料中存在的疑难问题,用民族语考释有关古代本土和周边的地名、人名。对西南边疆地域名称和历史人物研究有学术价值,有创新之处,可“补史之缺”。

2. 本成果也可算彝文汉译版的西南边疆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通过彝文史料研究当时的地方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有丰富、充实西南边疆档案史料的作用。证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元一体的或一体多元的格局,揭示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文化根源,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之间合而不同,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我们要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进一步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3. 本成果的借鉴作用在于,民族研究既要从微观——一个地名、一个人名、一个家谱的个案研究入手,又要从宏观的整体来看,放在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地域、一个共同文化背景下来研究,即把历史文化研究放在西南夷、云贵高原、巴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和中华文化的背景下研究,不是孤立的“见木不见林,见林不见森”。

4. 运用多种综合手段,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运用彝文古籍、金石资料、碑刻、田野考察、民族考古互补,即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民族文学相结合,彝汉文献对照的方法,大到对一个民族、一个语支、中华民族整体宏观的审视,小到一个人名、一个地名、一件史实的记录。

5. 因为族谱、地名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对研究民族史、地方史有一定帮助。运用彝族谱牒来研究西南边疆档案史料是一个创新的方法,提供了将民族文献与汉文文献相结合来研究地方史的一种思路、一种模



式、一种创新，优势互补。它能解决实际问题，不是脱离实际空对空的纯理论，而是用活生生的沿袭至今的祖先崇拜的遗迹——家谱、支系谱、族谱的传承，用一代代父子连名的部落酋长谱、君长谱、祖妣谱及他们对管辖区域的经营来印证西南夷的活动区域范围。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来验证史籍的真实性、可靠性。家谱与正史、方志一样是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学大厦的三大支柱之一。此外，用民族语解释地名，可以起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之效。

6. 本书为了节省篇幅及便于对比，有条理又直观，将许多零散的史料梳理、综合、简化，将其制成表格，好像“压缩饼干”使人一目了然。为了增加直观性、趣味性、可读性，选了一部分图像、地图、实物照片以充实成果。

四 本成果突出特色和主要建树

1. 用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丰富的动植物资源，适于生物以及人类的繁衍，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各民族先民们曾经在这里创造过辉煌的文明，并不是蛮荒之地。

2. 各民族共同开发西南边疆，其中彝语支民族先民是开发西南边疆的主体民族之一。各民族有共同的渊源，共同传说是从葫芦里出来或洪水后兄妹结婚而繁衍出各民族。通过彝文、汉文秦简的对比，说明民族间自古就有文化交流，同源异流，进一步证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理论。这里须要特别强调的是，纵观彝文古籍，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民族的团结历来是彝族的主流，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当今增强各民族凝聚力、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3. 彝文史料记载的不单是彝族史，也是彝语支民族史、云南民族史、云南地方史、西南边疆民族史，是中华民族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 该成果首次将我国少数民族古籍中的彝文史料做了系统研究，充分运用近年出版的大批彝文古籍翻译系列丛书中的史料，有理有据，观点鲜明，不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史料，真实、可信、可靠，对丰富西南



民族史，丰富西南地方史，丰富中华文化宝库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具有开创性，将掩埋在浩瀚的民族文字典籍中的宝贵史料挖掘、提炼出来，对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有重要意义。

5. 首次总结出彝文古籍的四大特点：

(1) 史诗不分，史诗合一。史的诗化，诗的历史化，史即是诗，诗即是史，以诗咏史，以史为诗。换句话说，文史不分，文史合一，文即史，史即文。

(2) 人神不分，人神合一。人的神化，先人后神，神的人化，先神后人。

(3) 因政教不分、政教合一，导致巫史不分，巫史合一，巫中带史，史中带巫，宗教迷雾下掩盖着历史科技。如所谓的“鬼主制”，部落酋长既是君长、头人，又是宗教领袖、祭师、智者。因盛行祖先崇拜，祭祖灵（巫）通过祭祖颂扬祖先业绩（史），被误认为是祭鬼，所以误称为大小“鬼主”，以讹传讹。

(4) 学科不分，多学科合一。例如《指路经》既是宗教用书，又是历史书（有祖先迁徙的历史路线）；既是地理书（有若干古地名），又是文学书（描写沿途山川景色）。

6. 首次探讨古滇国的创建者。

7. 首次探讨远逝的宋代自杞古国。

8. 首次为元明清女土官立传。

9. 首次用民族文献、民族语言解释西南边疆历史地名，如对滇、昆明、靡莫、夜郎、牂牁等若干地名、部族名作出合理解释。如云南通海县秀山公园大门牌坊上有“尼郎胜景”四字，但绝大多数人不知“尼郎”为何意，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它是汉字记夷音，“尼”为夷人自称，“郎”为山川、河谷、田坝，说明云南通海坝子曾经是夷人住过的地方。

10. 用碑刻中的珍贵史料等来印证历史。如“寻甸安氏族谱碑”、“镌字岩彝文摩崖石刻”、乾隆五年（1740年）发布的“为严禁扰累苗民以安边境事”的彝汉文对译布告等，都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然，本书涉及面广，对提到的每个观点、问题不可能都说得清楚，有的需专文、专著来论述。由于本书中人名、地名较多，且多译自彝语，



所引用文献译者不同故译名不尽统一。特此说明，敬请谅解。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课题符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整理民族古籍的指示精神。1981年中共中央37号文件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子孙后代的工作。”

国发〔1984〕30号文件指出：“少数民族古籍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强这项工作的领导，并在人力、财务、物力方面给予支持；要为从事整理民族古籍的专门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的通知》中说：“少数民族古籍范围广，种类多，现懂民族古籍的人已不多，且有的年事已高，在工作中要注意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把抢救、整理民族古籍的工作搞好。其他省、直辖市也应做好民族古籍的抢救、整理工作。”

云南省政府办公厅1984年11月发的有关文件中也指出：“我省少数民族古籍范围较广，价值很高，是探索云南历史、文化渊源和其他科学研究不可多得的材料，是祖国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抓紧做好抢救、整理工作。”

我们深信，有各级党政部门的重视、支持，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出版工作将迈上新台阶。

目 录

前 言	(1)
绪论 彝文古籍与西南边疆历史概述	(1)
一 云南考古证明云南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	(1)
二 彝族及彝语支民族先民是古代西南地区主体 民族之一	(9)
三 彝文古籍概述	(12)
四 彝文古籍的史料价值	(32)
第一章 彝文古籍记载的西南边疆古文化	(60)
一 彝族火的发明与使用	(60)
二 彝族天文与历法	(67)
三 彝汉古文化对比研究之一——秦简日书与彝文 日书的比较	(74)
四 彝汉古文化对比研究之二	(78)
第二章 彝文古籍记载的西南边疆古代史	(101)
一 彝族古代氏族史——夷焚时代史	(101)
二 彝文古籍《夷裔千百代》	(107)
三 《前六祖史》摘要	(114)
四 《后六祖史》记载彝族祖先笃慕及六祖分支、 六祖之子、六祖之名	(117)



五	彝文古籍记载的氏族部落史	(124)
六	滇黔部分彝文古籍简介	(130)
附	彝族祖先笃慕研究	(140)
第三章	彝文古籍与西南边疆历史人物、古代方国	(161)
一	彝文古籍记载的蜀汉入彝地	(161)
二	揭秘古滇国传奇人物——支格阿龙	(162)
三	有关夷人部族、人物的研究	(173)
四	唐代的南诏国	(204)
五	揭秘远逝的宋代自杞国	(213)
第四章	彝文古籍记载的西南夷及其后裔君长列传	(235)
一	各地夷区夷裔能人排名	(235)
二	德布后裔罗婺部君长及后裔祖妣谱	(237)
三	恒部后裔昭通乌蒙部君长世系谱——盐津罗氏家谱	(249)
四	德施后裔镇雄芒部君长谱	(252)
五	德施后裔东川、会泽、阿芋陡君长祖妣谱	(258)
六	德布后裔沾益州(宣威)安氏谱牒	(260)
七	元明清彝族女土司列传	(264)
第五章	彝文古籍军事著作	(273)
一	《彝家兵法》——部族作战中的七十贤子	(273)
二	彝文军事文献《布默战史》	(278)
第六章	彝文碑刻——刻在木石上的历史	(286)
一	禄劝镌字岩彝文摩崖石刻	(286)
二	寻甸安氏族谱碑——古滇移民的见证	(294)
三	汉延光民族史籍碑	(300)
四	昭通陆米勒彝汉文碑	(302)
五	红河弥勒龙母箐彝文崖碑	(303)
六	石屏乾隆彝汉文布告(木刻版)	(304)



第七章 彝文古籍中的西南边疆地理（地名）研究	(309)
一 彝文古籍在研究西南边疆地名学中的突破	(309)
二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部分夷语地名和 部族名号考释	(311)
三 西南边疆历史研究中常用族名释义	(314)
四 西汉时期的云南郡县地名古今对照	(316)
五 东爨三十七部与元代郡县彝语地名对照	(317)
六 东爨三十七部地名古今对照	(319)
七 滇黔彝汉地名对照	(321)
八 寻甸县地名中与彝族氏族有关的地名	(322)
九 禄劝县地名中与彝族氏族有关的地名	(323)
十 沧海桑田话“昆明”（兼释“谷窝”）	(323)
十一 云南峨山彝文古籍《白夺书》（山名录）	(326)
十二 红河州绿春县施氏土守备家族迁徙路线	(327)
十三 贵州彝文古籍《西南彝志选·地理志》部分地名	(329)
十四 各朝代有关西南夷及后裔活动分布地	(330)
参考书目	(335)
后 记	(337)

| 绪 | | 论 |

彝文古籍与西南边疆历史概述

一 云南考古证明云南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

“几个石头，人与猿揖别”，从猿到人。云南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适合人类繁衍生活。据报载：1984年澄江发现距今5.3亿年的寒武纪动物化石，共有两百余件珍稀动植物化石和遗迹化石，是迄今世界上发现古生物门类最多的区域，被中国科学院称为“地球历史早期生物演化实例的世界第三大奇迹”。

距今800万年的禄丰腊玛古猿已经能够直立行走，是一种稳定的从猿向人演化过程中的类种，具有接近早期直立人的很多特征，已经基本上摆脱了树栖生活，从树上走到了地上，并在与大自然的艰苦斗争中不断繁衍，不断发展进化，向着早期直立人方向缓慢地前进。国外报刊认为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人类起源的钥匙掌握在中国”。

2006年经有关学科确定把元谋古猿定名为蝴蝶禄丰古猿。禄丰、元谋古猿的发现数量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专家初步分析认为：云南特别是禄丰可能是晚新生代古猿的“避难所”。

1965年在元谋盆地上那蚌村西北山上发现的2颗外形类似人牙的化石，经科学鉴定为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和“蓝田人”“北京人”同属直立人，与“丽江人”这些晚期智人在人种上有承袭关系。“元谋人”可能是现代的黄种人分支中亚洲人、美洲印第安人、北极爱斯基摩人的共同祖先。



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国人类历史发展从 70 万年前北京猿人向前整整推进了 100 万年。元谋，这个彝州的无名小县，因“元谋人”的发现，而从此被写入了人类历史教科书。

可是近年来有一种说法，根据“DNA 的秘密：北京猿人不是华夏祖先。全球科学家参与的基因研究表明，中国人的祖先源于东非，汉族和藏、苗等少数民族本出同源。我国科学家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祖先源于东非，经过南非进入中国。这支南亚先民经过多次迁徙及体内基因突变，逐渐化成为各个民族”。

还有一些学者说的更具体，中国人的祖先是 10 万年前东非的一个老祖母那里传出来的。这些说法是否正确，目前没有定论，可备一说，我们再来看一下云南近 60 年的考古情况。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 60 年，云南省考古发掘从未间断，成果丰硕。考古调查、发掘所获各类文物已近 30 万件，云南考古学因具有明显的地方民族特色而自成体系，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为研究云南地方史、云南民族史提供了无言的证据。

（一）云南是古猿的故乡

据李昆声、胡习珍《云南考古 60 年》^① 报道：云南多地发现许多古猿化石，其中有开远市（小龙潭）、禄丰县（石灰坝）、保山市（羊邑）、马关县（仙人洞）、广南县（硝洞）、西畴县（马桑洞）。

1956 年 2 月，在开远市小龙潭褐煤层中首次发现了距今 200 万年的开远古猿臼齿化石标本。

1975 年 5 月，在禄丰石灰坝褐煤堆积物中发现距今 800 万年的禄丰腊玛古猿化石。

1988 年 3 月 14 日，在元谋县小河村蝴蝶梁子发现了古猿化石。这是迄今为止我国上新世地层中出土的唯一一具古猿头骨化石。1992 年，姜础在元谋县班果乡雷老村采集到一批古猿和哺乳动物化石标本。至此，在元谋各化石产地发现古猿头骨化石 1 具、上下颌骨 20 余件、牙齿化石

^① 参见李昆声、胡习珍《云南考古 60 年》，《思想战线》2009 年第 4 期。